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文化观照

张小曼, 朱思玲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译者的文化认同是译者基于价值观而构建的对母语文化的坚定信念, 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译者对文化的理解, 内化为译者对文化的归属, 显化为译者对文化的传承。辜鸿铭身处中西文化的交汇之中, 视《论语》英译为传播与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与责任。辜鸿铭的文化认同体现为: 通过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来引导目的语读者, 让其形成对儒家思想的正确认识; 以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为根本, 通过归化翻译让其产生对中国文化的灵魂共鸣与皈依感; 通过采用文意扩充、添加注释和引用西方经典语录等方法, 让读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互动中感受儒家思想的脉动与精神, 于润物细无声中将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关键词: 辜鸿铭; 《论语》英译; 文化认同; 文化理解; 文化归属;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H 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5)03-0225-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0520266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ZHANG Xiaoman, ZHU Sil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translator's firm belief in his or her mother tongue culture and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one's valu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t is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internalized as one's affiliation with culture, and manifested as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u Hungming regard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as his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disseminate and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His cultural identity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he guides English readers through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onfucianism. Secondly, given the needs of the English readers, Ku helps them to have a spiritual resonance and a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by means of domestication. Finally, by exp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adding annotations,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classic quotations, he leads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essence and spirit of Confucianism i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an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thus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ern world in a special manner.

Keywords: Ku Hungmi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understanding;

收稿日期: 2023-05-20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4D110)

第一作者: 张小曼, 女, 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英美文学。E-mail: slyzxm2008@163.com

cultural affiliation; cultural heritage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至今已有40余种语言的译本,仅英译本就有110种不同版本,其中包括辜鸿铭所译的版本——*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不拘泥于对字面的忠实,辜氏开拓性的儒经英译呈现出一种再现原著精神和文化风姿的面貌。目前,有关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较为丰富,却未能全面反映其历史价值。辜鸿铭在翻译时对中华文化的处理有自己缜密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体现了译者的文化认同和自觉意识,其翻译促进了西方世界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本文从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遗产三方面分析辜鸿铭《论语》译本,揭示其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时代意义。

一、翻译中的文化认同

迄今,国外对辜鸿铭《论语》译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如:解读《论语》教育中的对话精神^[2];分析《论语》中有关领导力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管理人员的影响^[3]。国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从转喻视角探讨辜鸿铭对民族文化的传达^[4];从阐释视角出发探讨辜鸿铭的跨文化阐释^[5];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分析辜鸿铭的翻译方法^[6];从语料库角度探讨辜鸿铭的翻译风格^[7]或分析其对《论语》中核心概念词“孝”的理解^[8];结合例证法和解释法分析辜鸿铭的翻译策略^[9];从文化间性出发探讨翻译主体的对话^[10];在“第三空间”视域下探究辜鸿铭的归化翻译策略^[11];等等。上述研究虽然有助于人们认识辜鸿铭《论语》英译的某些特征,但远远不能揭示辜译本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在传统的翻译理论里,译者被视为仆人,其责任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为二者沟通建构一条便捷的通道^[12]。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由边缘移向核心,推动着翻译的生成^[13],翻译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4]。译者应力求使文本的接受效果在源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达到一致^[15]³²,但翻译与其说是语言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16]。

译者不应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范围内进行翻译,而应以文化为单位,实现原文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对等。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指出,译者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语言只有与文化融为一体,翻译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17]²⁵。因此,译者对文化的处理在翻译生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处理与译者的文化认同密切关联。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主观依赖性,会帮助个体确立对其所属群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18]²⁵。译者的文化认同是译者基于价值观而构建的对母语文化的坚定信念,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译者对文化的理解,内化为译者对文化的归属,显化为译者对文化的传承。译者的文化认同来源于译者的民族情感,在翻译实践中帮助译者确立自己的文化归属,厘清自己的文化立场,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可见,文化认同与译者对文化的理解、归属和传承密不可分。鉴于此,下文从文化的理解、归属与传承三个方面探讨辜鸿铭的《论语》英译。

二、文化理解

文化理解指对文化的解读与认识。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是在掌握原文语言精神、作者语言特色和作者思维感知方式的基础上重构原作意图^[19]。狄尔泰认为:“理解是我们通过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而去认识内在思想的过程。”^[20]⁹⁷所谓外在感官所给予的符号,实则描述的是心理状态的表达过程,通过心理状态这一中介,与内在思想进行沟通交流,从而达到理解、解释和表达思想的效果。如若将情景假设在翻译的过程中,即译者通过语言这一符号中介,与原文的潜在思想进行沟通后,形成自己对文本的正确认识。对于理解,伽达默尔强调它的历史性:“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³⁴⁷前见是人们在理解与解释之前的意识存在状态,是基于自身以往经验对某一事物或事件所做出的预判。这种预判的成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但前瞻有助于提前认识事物,成为美好的预见。参考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理解是在已有的认知水平上去认识某一事物或事件,从而达成一定的共识或是产生新的看法。故而,

文化理解是指在当前文化水平上对某一文化现象、特征以及本质的认识与反思,包括对文化历史的了解、文化内涵的领悟以及文化价值的领会等。此外,文化理解也会因理解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能力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正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既受“译者的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也受“译者的翻译目的、接受语境和赞助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22]。因此,不同的译者即使面对同一文本,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读者的文化吸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文本所处时代和区域的文化理解。因此,若译者不能对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有正确的理解,那么译文极易使读者对源语文化产生误解,这种结果显然不是译者所期待的。

中国古籍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23]。文化理解是实现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求。辜鸿铭的中国古籍翻译之旅深受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影响。卡莱尔痛陈西方现代文明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毒素对人类的侵害,鼓励辜鸿铭学通中西,在中国文化经典中寻找人类文明的出路。卡莱尔身上强烈的批判精神、犀利的词锋震撼了辜鸿铭的灵魂,透彻的眼光与深远的洞见帮助辜鸿铭树立了人生坐标,使辜鸿铭带着一份“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坚定了日后回国求学和探索人类文明的人生走向。辜鸿铭《论语》译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该译本熟练引用了西方古典和名家哲言,这种信手拈来的熟练度源于辜鸿铭对西方文明与社会文化的深刻了解。辜鸿铭深知西方世界存在的弊端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故而把重心投注到中华典籍的翻译活动中。

在挑选翻译对象时,辜鸿铭将目光集中在《论语》上。《论语》是民族文化典籍的高峰,尽显孔子的智慧之光,其儒学思想可划分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九个方面。其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一切德行的总和。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辜鸿铭将他所处时代的视野与孔子及其后继者的过去的视野进行“融合”,对《论语》的儒学思想进行深刻的研讨和领悟。《论语》英译标题“*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象征了辜鸿铭解释儒家思想的

独特方式,也凸显了他的主观能动性。辜译本的标题通俗易懂,直接点明译作与孔子语录相关,使西方读者一眼就能抓取文章的核心内容。辜鸿铭的翻译直截了当,开篇不仅简要介绍了文本内容,而且为翻译方法进行铺垫,指明其翻译通过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等名言语录与孔子及其后继者的话语和行为进行类比。显然,辜鸿铭最终证明了他的翻译方法确实实现了让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论语》的目标。辜鸿铭徜徉在中西方的文化海洋里,将西方名人典故与中国圣人典故相结合,使得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汲取孔子的道德和教育思想。

除了标题的选取,章节间的重新排列也体现了辜鸿铭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在行文的逻辑结构方面,辜鸿铭将话题相同或人物对话关系紧密的部分安排在同一章节,在保证内容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前后逻辑连贯,为目的语读者打造一种舒适的阅读方式。在辜译本中,公冶长和南容等孔子弟子,都以“disciple”的身份出现在与孔子的对话中。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因为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人的历史背景并不熟知,从而以简单的师徒关系来展开叙事,重点突出其中的哲学道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弟子只是用来阐明道理的特殊角色^{[24]90}。

例1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A man who is not in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a country should not give advice as to its policy.”^{[24]175}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should never occupy his thoughts with anything outside of his position.”^{[24]309}

例1两句描述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曾子对从政行为的看法。前一句出自《泰伯》篇,讲述的是孔子的观点,即不去谋划不属于自己职位的政事;后一句则出自《宪问》篇,描述的是曾子的看法,即君子思考问题,从来不超出自己的职务范围。前者着重体现不为官者不得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后者则强调智者只做自己分内的事。尽管上述两章的主题有些许相似,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拆分为两章更利于理解。“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

他们对原作的选择和翻译过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25]辜鸿铭通过自己对《论语》的理解来引导目的语读者,让他们在阅读译文的过程中,形成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识和理解。

三、文化归属

文化归属是指对某一文化的认同、亲近和依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难免会受自身文化观的影响,通常会带有一定的文化偏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翻译活动中译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动态距离调整^[26]。译者的文化偏好主要体现在译作的文化倾向中,或使用译入语文化来取代源语文化,或直接描述源语文化,或在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建立一个链接,在考虑目标读者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彰显文化特色,传达文化内涵。

译者的文化归属的形成可归因于三点。一是“文化转向”风潮促使文化归属提前出现。“文化转向”要求翻译研究不应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应转向文化层面,在文化语境下去理解、阐释和再创造文本。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译者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使其在翻译思维上表现出某一文化取向,即文化归属。二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地位的差异使文化归属这一“萌芽”不断生长。翻译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在翻译活动中,若有一方更为强势,那么它就极有可能成为最终的文化倾向。例如在20世纪初,英美文化一直是西方翻译的主导力量,译者往往进行直接而透明的翻译,传达英美主流文化^[27]。三是翻译文本类型和受众需求迫使文化归属存在。前者主要体现为:译文需要寻找与目的语类似的表达形式,以目的语文化的标准进行翻译,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比如译文的“诱导”功能,当原文内容难以发挥时,译者可对原文信息进行删减^[28]。后者主要体现为:任何译本都有受众对象,译本的意义与读者为何选读该译本息息相关。译者把读者的目的纳入考虑范围,就是以读者的文化喜好为导向来进行翻译。因而,文化归属在翻译中是必然存在的。

文化归属体现为人们对文化的认同和接纳。当人们发现文化与自身存在共同之处时,就会产生一种亲密感,更进一步便是从灵魂的共鸣与欣喜中产生的皈依感。中国读者在阅读《圣经》时

难以为圣城耶路撒冷的劫难叹息,但在诵读屈原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时却因感受哀伤而潸然泪下。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使读者产生认同感的文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读者的价值观和个人性格。这些令人亲近的文化深藏于每个人的文化基因中,当再次触碰时,它就从朦胧的潜意识化为自觉清醒的自我认知。

在辜鸿铭的年代,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对诸多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世界的许多书籍、科技、文化与宗教都被翻译并传播到中国乃至其他地方,日常生活里不乏看到有人推崇西方文化和思想。纵观中国文化的传播史,中国文化大都由传教士和使臣传到西方国家。但文化传播效果有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西方群众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甚至偏见,以至于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传播者未做到对文化精髓的精准把握,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就会丢失其原本宝贵的价值。一战之后,西方社会显露出各种弊端,怀有救世情怀的辜鸿铭投入到东方文化的研究中,试图通过翻译儒家经典著作来传播儒家思想,盼望目的语读者能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并尊重中华文明。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29]^[27]。辜鸿铭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水平为基准和导向,融合东西方文化,以符合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风格的方式开展文化传播。在翻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时,他并没有将“师”直译为“老师”,而是用 men 代替 teachers 来传达该句的深层意义:除了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身上学习道理、规律或经验外,也可以从术业有专攻的各方人物身上汲取知识以增长学识。

虽然辜鸿铭运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翻译策略,即以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为根本,添加西方文明中的象征物及名家语录,但这并不意味着辜鸿铭在心理上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的极度认同感并以其为心灵的归属。文化归属对翻译策略起决定性作用,但单从翻译策略方面无法完全断定译者的文化归属。译者对某一翻译策略的倾向并不绝对地等同于对某一文化的倾向。辜鸿铭是根据自身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有目的地进行翻译。他努力把控译文忠实度“剂量”^[30],在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在带给读者舒适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征与内涵。

例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译文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art held by the ancient kings it was this quality in a work of art which constituted its excellence; in great as well as in small things they were guided by this principle."^{[24]14}

从例2可知,有子认为“礼”的推行实践应注重“以和为贵”,无论大小事,都应顺其自然,在“礼”的节制范围内追求和谐。古代帝王治国之道的秘诀就在于此。有子所言的“礼”不仅指风俗礼仪,更指民族的道德规范。对于“礼”,理雅各将其翻译为“propriety”^{[31]97},意味着对行为的规范,而辜鸿铭则将其翻译为“art”^{[24]14}。

“礼”的内涵不应局限在礼节的规矩这一层面,更多的应体现为辜鸿铭所说的“natural spontaneity”^{[24]14}中的价值,也就是达到孔子所言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艺术之境。礼制所求,便是美感生活之求。当人们言行举止符合礼节时,言语之美、举止之美、道德之美等就会显现出来,这不就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吗?辜鸿铭的翻译不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以最大能力让西方读者读懂文本,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意蕴,供目的语读者细细品味。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译者自身的文化归属。

此外,辜鸿铭对中华文化的极度痴迷以及由此产生的欣喜感,归因于他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和对孔子思想的尊崇。他评价《论语》是一本给予中国人智识和道德装备的书,并希望通过翻译此本小书引起西方群众对中国固有成见的反思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同^{[24]2}。在翻译时,辜鸿铭在注释中用西方人熟知的圣经人物类比《论语》中出现的人名,例如,将颜回比作《圣经》中的圣·约翰,将子路比作圣·彼得,将尧比作亚伯拉罕等。此外,在部分章节中,辜鸿铭用闻名欧洲的名家语录或作品内容类比《论语》中的故事情节,例如,将孔子对诗歌的看法与华兹华斯对诗歌的态度进行相互照应,在《论语·子罕》第30节里将孔子吟诵的诗歌与歌德的诗歌进行相互照应,等等。类比这一翻译技巧有效避免了读者因摸不着头脑的人名或难以领悟的文本内涵而选择省读的这类情况出现,不但降低了读者对文本

及中华文化的疏离感,而且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26],达到了吸引读者和传播文化的目的。

辜鸿铭的文化归属,还可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来理解。在语言层面,辜鸿铭以归化翻译策略为主,“尽量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32]42}。例如,《论语》中出现的“子”在他的笔下均以孔子的弟子身份出场,原本复杂的人物关系因此变得清晰,读者即便不熟知中华文化,也依然能够轻松理解。通过归化翻译,译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更符合西方表达习惯,但原文的韵味并未丢失,仍能从每段对话中感受到孔子弟子们的性格特点,可谓“无形胜有形”。在文化层面,辜鸿铭在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建立了微妙的平衡:他既不过度推崇西方文化,也不过度推崇东方文化,而是将二者有机融合,创造性地呈现新的文化风貌。辜鸿铭擅长使用类比方法,将中国古代人物比作圣经人物,将孔子思想或看法与西方著名人物的思想或观点进行对照。他在保留原著文化特征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将原著的人物情节和思想内涵翻译出来,在冷静和清醒中积极传播儒家思想,让蕴藏无限智慧的中华文化持续搏动,以此表现自身的文化归属。

四、文化传承

文化内蕴于一粥一饭,流淌于一人一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文化不是空中楼阁,它依靠传承的土壤滋养自身,并以口传、书籍、文物等方式在世间流传。文化传承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将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道德品格、行为方式和民族精神等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明成果加以积淀和继承^{[33]39}。文化传承分为继承、传播和弘扬三步,体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互动中。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认为,翻译的重点在于通过引入差异来丰富译入语国家的语言和文化^{[34]141}。翻译不仅要传达差异,更要承担“开拓语言空间、再现原作文学性和丰富文化的使命”^[35]。两种文化的交流前提是译者在继承文化过程中,要做到精神的领悟、思想的领会以及美的欣赏。译者在继承文化的基础上,将

文化以书本、口头语等形式传播出去,进一步在目标群体中弘扬文化精髓。要精通两种文化的思维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对译者的翻译水平提出了高要求。译者不仅要“认识自身文化”,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还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36]。进行翻译活动前,译者应事先对源语文化或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刻的探究和思考。在译文的处理过程中,译者需分析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在衡量文化差异和读者接受水平的基础上,选择最佳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事后,译者应实时关注译著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文化在目标群体中的吸收情况。没有翻译的作用,国家或民族间的思想文化借鉴只能凭空想象^[37]。因此,译者在文化的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论语》是孔子思想的载体,是孔子的文化苦旅,是给予后人的文化盛宴。它于生活语言中见空灵,于古老文字中见生机,于渊博学识中见智慧,于海人不倦中见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论语》不仅是孔子思想的载体,更是中华古典文明的载体,象征着一种儒雅的风度、崇仁尚德的心灵高度。身为华夏儿女,我们应勇于成为这一载体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扬者,在提升自我精神境界的同时,让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土壤里深深扎根。

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动机之一是向西方传播中国优秀的儒家文化,要让西方人士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和暴力,并吸收、尊重仁爱平和的中国文明。19世纪末期,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开始追逐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辜鸿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伦理思想,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他宣称中华文明顺应历史潮流,永远不会消亡,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欧洲文明^{[38]71-73}。这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促使他从事《论语》英译工作,向世界传播儒家思想。

辜鸿铭的另一动机是希望通过翻译提升中国的地位,改善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的形象。虽然早期有传教士和汉学家将东方文明带往西方世界,但从文化传播效果来看,依旧存在不足之处,大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风俗人情等存在偏见与误解。中国古典著作的英译质量不佳也被归因于此。因此,辜鸿铭试图重译包括《论语》

在内的中国经典,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文化,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并在阅读中自发地产生道德责任感,以更文明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东方民族和中华文明。《论语》语言简洁,含蓄隽永,普通读者难以洞晓文意。因此,辜鸿铭采用三种方式补充文意:其一是对原作进行扩充;其二是在译作中添加注释;其三是引用西方古典文明和名家语录。

例3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译文 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24]33}

例3原文是一个独立的四字句,因为没有上下文语境,读者难以领悟。辜鸿铭对语意进行扩充与阐释。首先,他在“machine”一词后面添加了解释性的词语,意在告知读者这里的“不器”是指君子会让自己具备做多件事情的能力。其次,辜鸿铭对“器”字做出了详细说明。所谓的“器”是指现象,通过与象征本质的“道”进行对比,突出了该句的核心思想:小人重现象轻本质,君子重本质轻现象,要想通过现象控制本质,就必须知道本质的规律。辜鸿铭将无形的抽象概念化为有形的哲学道理,既做到了对文化的传播,又实现了文化在异域的扎根。

例4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译文 Confucius in his book, was gracious but serious; he was awe-inspiring but not austere; he was earnest but unaffected.^{[24]161}

例4原文对孔子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外表和蔼可亲,庄严肃穆,令人敬畏但不凶狠严厉,诚挚正直但不矫揉造作。辜鸿铭在译文的注释中加入席勒的诗歌,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前半部分对孔子形象的描述中可以得知孔子是集亲切与严厉于一身,正好对应儒家道德标准中的中庸,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后半部分席勒诗歌中的姑娘也是集清纯与高贵于一体,不卑不亢,分寸恰当。显然,二者都强调对得体适中的追求,合乎“中和”原则。辜鸿铭对西方著名诗歌的灵活运用彰显了其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文明交融互通的认识,如此才能让读者轻松地融入语境,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而达到文化遗产的理想效果。

五、结语

千般文化,交流为本,翻译为介。正是因为译者自身对母语文化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儒家思想的强烈认同,《论语》成为了辜鸿铭的翻译对象之一。在他看来,中华文明蕴藏的道德力量,对于一战之后普遍有厌战情绪的欧洲人民而言,无疑是能够引起反思和警醒、昭示希望、安抚心灵的智慧之言。从对辜译本的分析可知,无论是对内容的忠实度的把控,还是对文化的完整性的保留,辜鸿铭都秉持了高度的专业性和原则性。在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观面前,儒家文化在辜氏的理解中实现广泛传播和传承,辜氏自身的文化归属也在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灵活处理中得到充分彰显。因此,从文化理解、文化归属和文化传播三方面分析辜鸿铭的《论语》英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辜鸿铭的翻译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也为世界文化交流提供了范例。

参考文献:

- [1] YANG L W, ZHOU G J. A semantic similarity analysis of multipl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Analects*: based on 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lgorithm[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992890.
- [2] WOO J G. Revisiting the *Analects* for a modern reading of the Confucian dialogical spirit in education[J].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9, 51(11): 1091–1105.
- [3] VASZKUN B, KOCZKÁS S, GANBAATAR T, et al. Does Confucius have a say in management toda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sia and Europ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2, 17(2/3): 198–221.
- [4] 屠国元, 许雷.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彰显——转喻视角下辜鸿铭英译《论语》策略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8(6): 211–215.
- [5] 刘永利, 刘军平. 双重跨越与整体表达——辜鸿铭儒经英译的跨文化阐释[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1(2): 110–114.
- [6] 杨林. 直译与意译——理雅各与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功能语言学比较与分析[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136–139.
- [7] 吕鹏飞, 陈道胜.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英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以辜鸿铭和亚瑟·威利两译本为例[J]. 上海翻译, 2021(3): 61–65.
- [8] GUO Y Q.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Xiao”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ased on LanksBox——tak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Ku Hung-Ming and James Legge as an example[J].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22, 148: 02025.
- [9] DAI X, WANG X Y. The domestication strategy adopted in Ku Hung-ming’s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its influence[J].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021, 23(3): 1–10.
- [10] 张小曼, 孙晓璐. 辜鸿铭《论语》英译主体“同质语境”中的对话[J]. 中国翻译, 2022, 43(6): 92–99.
- [11] 李爱云. “第三空间”视域下辜鸿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121–123.
- [12] 胡作友, 彭九州.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J]. 中国翻译, 2023, 44(2): 26–34; 188–189.
- [13] 刘云虹. 文学翻译生成中译者的主体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22, 54(4): 590–599; 640.
- [14] 刘云虹, 许钧. 新时期翻译批评的走向、特征与未来发展[J]. 中国翻译, 2022, 43(2): 5–13; 191.
- [15] NIDA E A, TABER C 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6] 谭载喜. 翻译的界、两界与多界: 一个关于翻译的界学阐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21, 53(6): 937–947.
- [17]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4.
- [18] ALBA R. *Ethnic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White Americ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9] 李征, 张春柏. “异化”的翻译与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重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J]. 学术探索, 2015(6): 134–138.
- [20] DILTHEY W.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orks, Volume II: Understanding the Human Worl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1]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22] 胡开宝. 对话与多元——试析许钧翻译文化观点的特征、内涵与意义[J]. 中国翻译, 2021, 42(6): 68 – 73; 192.
- [23] 许多, 许钧. 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5): 130 – 137.
- [24] 辜鸿铭. 辜鸿铭讲论语[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 [25] 敖著名. 《新译红楼梦》的译者主体性[J]. 红楼梦学刊, 2022(4): 280 – 291.
- [26] 胡作友, 钟莎莉. 翻译距离与动态调整[J]. 中国翻译, 2022, 43(4): 5 – 12; 190.
- [27] VENUTI L. Introduction[C]//VENUTI L.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 – 17.
- [28] 邵璐. 当下中国翻译话语之哲学反思——以变译理论为例[J]. 中国翻译, 2022, 43(5): 134 – 141.
- [29]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30] 陈嘉琨, 刘云虹. 选择、互动与探索——雷威安与中国文学法译[J]. 中国翻译, 2020, 41(4): 101 – 109; 191 – 192.
- [31] LEGGE J. The Chinese Classics[M]. 2nd ed. London: The Clarendon Press, 1893.
- [32] SCHULTE R, BIGUENET J.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33] 李本友. 文本与理解——语文阅读教学的哲学诠释学研究[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 [34] BERMAN A.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M]. HEYVAERT S, tra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35] 许钧. 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J]. 外国语, 2021, 44(1): 91 – 98.
- [36] 刘云虹. 对话与共生——试析许钧关于中华文化译介的思考[J]. 外国语, 2022, 45(4): 72 – 80.
- [37] 许钧. 翻译是先锋, 语言是利器——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与语言问题[J]. 外国语, 2019, 42(4): 2 – 3; 6.
- [38] 辜鸿铭. 辜鸿铭英译经典《大学》《中庸》中英双语评述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责编: 朱渭波)